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八五六期 ——  
(二〇一二年七月二十三日出版)

---

本期目录 (zk1207c)

---

【抚今追昔】	知青运动中的“民族命运与个人使命”	秦 晖
【文艺评论】	什么是《知青》“激情岁月”的激情？	徐 贲
【痛定思痛】	“卞仲耘校长铜像揭幕仪式”观后	匡卫群
【一家之言】	我所知道的“联动”六冲公安部	马小冈

---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

## 【抚今追昔】

### 知青运动中的“民族命运与个人使命”

• 秦 晖 •

#### ◇ 兵团知青和插队知青

最近热播的电视连续剧《知青》以及关于“知青一代开始左右中国命运”的种种说法使人再次关注那场影响巨大的运动。与任何一国、一地、一个行业或“一代”之类的群体一样，“知青一代”的经历与价值观也是多元的——我甚至认为“知青一代”的多元更为突出。所以我反感那种动辄声称代表一国或一代人立言的说法。我只是作为当年知青中的一员谈谈自己的想法，我想这些想法还是可以引起讨论的。

要说明的是，当年的“知青”其实分属两大类：农场或“兵团”知青与插队知青。有时人们会把“回乡知青”作为第三类，事实上 1950 年代最早的“知青”还多是指他们。因为那时户籍身份制尚不严密，中学生也还奇货可居。在“大跃进”以前的工业化初潮中，农民子弟中学毕业“安排工作”的几率很大，回乡务农遂成为一种特别现象，谓之“回乡知青”。但是后来户籍身份制严密了起来，而且中学也算“普及”了（尽管“普九”直到世纪之交还在搞“攻坚战”，但文革时期基本上只读读“毛主席语录”的“戴帽初中”，即国家完全不投钱、“小学毕

业教中学”的“大队办初中”的确一度非常普及)， “农之子恒为农”遂成为理所当然，农民子弟读了中学回来继续务农与一般农民无异，国家的“知青政策”通常也不涉及他们。那时有些城里干部与其他“城里人”的子女不愿到国家指定的地方“插队”，而自行联系到父母原籍农村，“回乡插队”，那也算“插队”，与农民子弟回乡仍是不同的。所以大规模知青运动时期所谓的“知青”一般就指插队知青和农场—“兵团”知青，是不包括“回乡知青”的。

而这两类“知青”其实也有很大区别：“兵团知青”虽然也很艰苦，但当时算是分配了“正式工作”，领的是“国家工资”。虽然“工资”极其微薄，但仍比当时绝大多数农村生产队的“工分”收入高而且稳定。他们生活在国有农垦“单位”中，自成为一种独特的“知青社会”或“兵团社会”，其实与通常的农村 / 农民接触很少，甚至完全是隔绝的。他们的身份，好听的说法是“兵团战士”，实际是农场职工。虽然无法与在城就业相比，但在大规模知青运动初期，由于他们的“待遇”一般好于“插队”，还是令人羡慕的去向，那时无法留城就业的毕业生中，很多人曾千方百计找门路去“兵团”而不愿去“插队”。

但是，也正因为他们的身份算是国家职工，后来的“招工”一般就与他们无缘，只有“招生”（到大学当“工农兵学员”，那时没有“高考”，这种招生几乎完全是政治选拔）和“招干”适用于他们。而作为知青出路的这“三招”中，“招工”无疑是大头，招生招干的规模都不能与之相比，而且政审之类的限制也严苛得多。于是通过招生招干离开兵团的几率要比通过“三招”尤其是招工脱离“插队”生活的几率小得多，所以“兵团知青”的知青生涯往往比较漫长，超过10年的不算罕见。大量兵团知青都是在改革初期上山下乡政策取消后的“返城大潮”中集中返城的，后遗症（由于成家、大龄等原因回城后生存与就业都很困难）也更严重。事实上在知青运动后期，去“兵团”已经比“插队”更不受知青们的欢迎了。

而“插队知青”则直接被打发（“插”）到农村生产“队”去当“人民公社社员”，实际就是当农民。他们与一般社员一样“挣工分”，没有稳定收入。除了“知青政策”规定的一些照顾（主要是少量的“安置”费和第一年的生活费）外也没有什么社会保障，绝大多数人在整个知青生涯中经济都不能自给，要靠城里家庭资助。他们没有兵团知青那种“职工”身份，又不能获得“贫下中农”的“红色成分”，永远只能是非工非农的“接受再教育”的一群人，如果不脱离“插队”，老死了也只能叫“知青”。因此无论经济条件还是政治身份他们都不如那些“兵团战士”们，但他们真正是在中国社会最底层的普通农村当过农民的人，对农村状况农民生活的了解应该说超过兵团知青的。

而由于他们不被认为拥有“正式工作”，所以和农民一样当时都属于可能被“招工”的对象。又由于那时当局心里清楚他们实际上很难在农村“扎根”，时间长了难免成为不安定因素，只是因为经济萧条不得不推迟他们的就业，所以多数情况下，那时的下乡“招工”政策还是向“插队知青”倾斜的。事实上除了一些有门路的农村基层干部子弟可以抢夺知青的“三招”名额，一般农民子弟的招工机会还因为知青的存在而严重地减少了，这也是当时所谓知青运动造成“三不满意”中的“农民不满意”的一个由来。

因此平均而言，插队知青的知青生涯要比兵团知青短，他们大多数在农村2—4年就离开了，真正全程经历了知青运动盛衰过程的人并不多。由于是陆续离开，他们也没有形成兵团知青最后作为大龄“青年”集中返城那样的“大潮”。不过，由于当时的“三招”都有政审、体检条件，一些因“出身不好”或“表现不佳”（绝大多数与文革时的遭遇或与当地干部关系不佳有关）政治上受歧视者，或体检不达标者（如笔者是因为目疾），“插队”时间也会很长，乃至超过多数兵团知青。他们应当算是整个知青运动中遭遇最坎坷的一群人了。

此外，在知青运动后期，由于李庆霖“告御状”后知青分散“插队”的弊端逐渐引起注意，

知青政策出现了“集中安置”的趋势，除了在有条件的农村安置规模较大（一般都在10多个人甚至更多）的“插队知青小组”外，还兴起了一种创办“知青农场”集中安置知青的模式（以前也偶有此种做法，但不流行）。知青在这种“农场”中也是自成小天地，与普通农村/农民分离。但与国家为“屯垦戍边”之类战略目的设置的“兵团”农场不同，这类“知青农场”并非正式的国有农垦单位，只是作为分散插队的替代方式，承担临时安置功能。它们与城里的“街道工厂”一样属于所谓“大集体”，没有国家正式职工待遇和固定的收入，国家也同样在这些知青中实行类似插队知青中的招工政策。

因此笔者认为他们实际上是插队知青的一种变形，而与兵团一农场知青完全不同。与通常插队知青的区别只在于到了这时，知青运动的“就业缓冲”实际目的已昭然若揭，意识形态色彩已大为淡化，以至于形式上也采取知青与农民分隔的方式，不再顾及“与贫下中农相结合”“接受再教育”的方便了。很多县办的此类农场用于临时安置本县干部子女，遇有招工名额也优先拨给，使这种农场知青的流动性甚至比插队知青还大。农场本身也缺少长远前景，知青运动结束时它们基本都消失了。

以上两者中，插队知青的数量在整个知青运动时期要比兵团知青多得多，应当是“知青一代”的主体。但是他们当时就较为分散，后来在“回城大潮”中的影响也远不如兵团知青，由于平均插队时间较短，他们作为“前知青”群体的凝聚力也比不上兵团知青，因此在如今的“知青话语”中他们的声音也比较小。这次的电视连续剧《知青》也主要是反映兵团知青生活的，我并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对，但是我相信一个插队知青、而且是在村时间很长的插队知青的眼光留下的观察，也是有价值的。

#### ◇ 土插队与“洋插队”：关于我们与当年传教士的联想

从1969年到1978年，我作为插队知青在广西田林县的壮族山寨生活了九年，可以说基本经历了大规模上山下乡知青运动的全过程。我们那里是地道的农村，不是“兵团”或农场，那里地处滇黔桂三省之交，我们县又是广西面积最大、人口密度最稀的县。我们去的平塘公社离县城有两百里，走到通汽车的公路边也要60里，当时那里有的妇女一辈子连县城也没去过。我们那里也算“老区”，虽然田林县1949年以前并没有共产党的活动，但它所属的百色地区当年曾发生过邓小平领导的“百色起义”并由此出现过“右江苏维埃”，整个百色地区因此也属“革命老区”。那时常用“老（区）、少（数民族）、边（疆）、山（区）、穷（贫困县）”来概括中国的五类需要照顾的不发达地带。而这“老少边山穷”五样都占全了的地方，数来数去全国大概也就只有我们那里了。

然而就是在那样一个几乎与世隔绝的穷乡僻壤，一百多年前居然曾有法国的传教士在这里传教。当年的“西林教案”，又曰“马神父事件”，就发生在我们县（当时的西林县并非今天的西林县，那时该县大半辖境，包括县城在内，今天都属于田林）。此事成为法国参加英法联军侵华的口实，对“民族命运”的影响应该是众所周知了。那当然是一段国耻。而那位被清朝县官处死的“马神父”在我们的教科书上是西方的“文化侵略者”，而在天主教的记载中是“殉道”的圣徒。

后来搞了史学，我还真查过这事。当时清朝的上级官府说根本不知道这事（按清律，死刑是要报中央审批的），两广总督叶名琛更说是弄错了，袁伟时先生说这是桩“糊涂案”。不过无论历史评价如何，就他们个人而言，平心而论，这些人在几乎没有任何个人经济利益可言的情况下，“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不是到北京、广州那样的城市，而是到我们那个荒僻、贫困而又充满敌意和危险的滇黔桂边区“扎根农村”，乃至死在那里，也是出于信仰的力量。把这些来华传播基督教并促成中国教会建立的人们与后来苏俄派来传播马列主义并促成了中共建立的马

林、罗易等“国际使者”相比是很有意思的：前者扎根于穷乡僻壤，而后者游走于大都市；前者系政教分离下的教会所派，不像后者那样受本国政府派遣、深涉政治运作，在华也有更大的特权；前者的传教更没有后者那样成功，以致后者所传终成官方信仰而有了“政治正确”性，两者受到的褒贬也因而截然不同。

但是，两者来华都是出于信仰（这信仰是否“正确”另当别论），都是未经当时中国政府（敌视西方的清政府和敌视苏俄的北洋政府）允许的违禁冒险，从事这样的活动，套用这次的主题：他们都需要有很强的“个人使命”感，而他们的“使命”又强烈地影响了我们（以及他们）的“民族命运”。

我们公社渭各大队所在的金堂村，古时原叫刘家坨，清末法国传教士在那里修建了教堂后，人们就改叫“经堂”，也就是现在的金堂村。我们插队那时的生产大队部就设在那座教堂——哥特式尖顶已经没有了，但下面的门窗还都是西洋式的拱券。我曾在这个大队部住过一夜，记得当时墙外还保留有1951年大军进山剿匪时书写的大标语，是动员当地群众规劝匪亲出来投降的。1970年代我到这里时，已经20多年过去，这个“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小山村面貌如初。当地人说这里土匪出没不仅是解放初期，清代以来就是如此。

当时我就想，田林县已经是广西的边远县份，平塘公社又是我们县的边远公社，而渭各这个大队，在我们公社也是最边远的大队之一，就在这样一个土匪出没的山旮旯里，这些法国人要待一辈子，真是难以想象。后来我还得知，离金堂不远的另一个当年法国教堂所在地常井村还有个法国传教士墓地，不同时期来华的法国神父死后葬在那里的有6人，其中4人至今留有碑文，这4人都是来华传教1至4年就死去，享年仅20—30岁之间，真是令人感慨。当然他们要在这里传播基督教的努力基本失败了，一百多年后那里并没有多少基督徒。可是我们插队时声称要防修反修建设共产主义农村的想法，不也失败了吗？

#### ◇ 知青运动的世俗动机与信仰动机

要说后来我们这些知青，今天说起来也无非是两种调子：或者赞其“理想主义”（也就是信仰吧），或者哀其历经磨难。但是这两者要比起那些传教士来恐怕都还差得远：我们绝大多数知青其实是不得已而“上山下乡”，而他们基本都是出于信仰，志愿来传播福音的；我们多数待两三年就走了（我插队九年已经是我们这批知青中坚持最久的），而他们很多都终生在穷乡僻壤献身于传教，不仅吃尽苦头甚至丢了性命的也不在少数。与他们相比，我们的经历其实太稀松平常了。

今天评价知青运动的起因，不外是两种说法：“世俗动机说”指文革动乱期没搞建设也废了大学，城里解决不了大批中学毕业生的就业、升学问题，而这些被煽动起来革了两年命、造了两年反的“红卫兵”们在搞掉领袖不喜欢的“走资派”以后，也不再具有利用价值，必须尽快把他们遣散出城，以免他们继续“造反”添乱。于是把他们弄去“上山下乡”，在经济上可以消除城里的失业危机，政治上又便于建立文革后的“新秩序”。而“意识形态动机说”则强调当局这样做是为了“消灭三大差别”，实现伟大理想，知青们也是相信“与工农相结合”的真理，为了“防修反修”的信念而“满怀豪情奔赴农村”的。

我认为，这两种说法都有根据，两种动机也都存在。但是相比较而言，显然我们的信仰动机不能与那些传教士相比。这不仅因为我们中的多数并非情愿，更重要的是：发动这场运动的当局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把它当作一种惩罚，特别加之于他们不喜欢的人。尤其是我们这些直接到农村的人更是如此：如果说当时到农场、到“生产建设兵团”还需要某些条件，被“打入另册”者还不配去，那么农村则是完全没有条件、谁都可以去，越是被打入另册者还越不得不去，

而受宠者就可能不去的。所以林彪儿子搞的那个《571工程纪要》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话虽难听，当时却引起了很大震动。这就跟国外教会的传教运动完全不同，教会不会专门把它不喜欢的“异端”分子派到穷乡僻壤去传教，把它当作对后者的一种惩罚吧？

其实这样的事也不仅发生在中国，苏联当时许多被宣传得令人“热血沸腾”的“理想主义”事业，今天我们知道参与者绝大多数也非自愿。如著名的“共产主义志愿者建设工程”“斯大林白海—波罗的海通航运河”和远东那个今天以生产苏霍伊飞机闻名的“阿穆尔河畔共青城”等，其实都是劳改犯聚集，以苦役方式建设起来的“古拉格群岛”。甚至就是过去脍炙人口的“星期六义务劳动”也并不那么浪漫，当时苏俄大理论家布哈林在《过渡时期经济学》中就坦率地讲这是一种“过渡时期的‘超经济’强制”：“用于工人阶级自身的新型的主要强制形式之一，是消灭所谓劳动自由。”必须用“无产阶级专政下实行劳动义务制和国家分配劳动力的办法”来取代自由劳动。布哈林还驳斥了那种认为布尔什维克将允许工人罢工的“资产阶级教授的谣言”，他说：“在实行劳动军、星期六义务劳动和劳动纪律的年份还发出这种叫声，难道不可笑吗？”你还想为提高工资而罢工？反了你了！没工资白干你也得干，不干就叫你尝尝“专政”的厉害！所以这种“义务劳动”与今天从西方传入的志愿者、义工绝不是一回事，它可不是由着你发挥“理想”的！

我们也经历过类似的事，那时我们参加的不少水库、公路等“革命”工程也是以传统的徭役征发方式修建的，有时为赶工期，过年也不放人，号称在工地过“革命化的春节”。但是普通的农民民工还是大都逃跑回村了，没跑的除了我们少数知青，主要就是“四类分子”（地、富、反、坏）民工。我们没跑是因为村里不是我们的家，而且我们多属于施工员、会计之类不用干重活的“临时白领”，在工地的生活比在村里轻松。而四类分子没跑的原因很简单：他们是“专政对象”，不敢跑。于是便只有这些最不配“革命”的人来过“革命化春节”了——就像苏联用劳改犯来建设“共青城”。

但是也不能说，那时就完全没有理想和信仰这种东西。今天对于“青春无悔”之类的高调我很不以为然，但要说我应该是资格讲这种话的。当年我属于少数并非被强制动员、而是自己要求下乡的人，当时只有15周岁。在农村一待九年多，虽说并不是我非要“扎根”，总还是当时被看作“表现不错”的。在那里我入了团入了党，虽然并非大红人，但地、县一级的“先进会”我还是去过几次的。“粉碎四人帮”后“先进”恢复叫“劳模”了，我还在临离开之前当过一届县劳模。

但是我当年要求下乡，其实有具体原因，那就是文革中我参加的“广西4·22”一派当时是失败者，遭到严厉镇压。尽管我作为文革时刚进初中的“新生”只是无名小卒，并未受到冲击，但“毕业分配”时两派的待遇是不同的。属于胜利一派的同学可能有招工名额，我们这失败的一派则基本只能去下乡“插队”。我因为不到16岁，按规定不到“分配”年龄，应该继续读高中。然而在敌对一派掌权的学校继续呆下去我觉得郁闷，也看不到再读两年（当时高中缩短为两年）后会有什么更好的前途。加上我父母所在的教育厅属于“斗批撤”单位，他们都被宣布作为“下放干部”要离开省城到另一个边远穷县安置，我如果继续念书，到时恐怕也要随父母转学到那里。那么与其到一个陌生地方再读两年最后还得作为县里知青去插队，还不如现在就作为省城知青去了，还可以和我的那些伙伴们在一起。

我这样的动机应当说还是很寻常的。我们那一派当时还有一些人是“武斗”（其实就是内战）中战败被俘，被胜利者作为对“反革命”的惩罚，从俘虏营里直接遣送下乡的。当时随人发到县里的人事材料就要求对他们加以看管“改造”。这与那些为信仰来传教的法国人更有天壤之别了。

但是，即便是这些人也不是没有理想主义或信仰的推动。

◇ 我们为什么那么“积极”？

那个时代的一种现象今天的年轻人也许难以理解：不少人受迫害后的反应不是产生叛逆情绪，甚至也不是消极无奈，而是相反，越是受迫害越要表现自己对“革命”的忠诚。你说我是反革命？我就要干给你看看，到底谁才是最革命的！云南的一些受迫害的知青越境参加缅甸共产党军队为“世界革命”流血牺牲就是典型的例子。

我们那里不靠缅甸，无法走这条路，但是越受迫害表现越积极的现象同样存在。我的朋友陈念昆后来到上山下乡运动末期成了全广西第一号知青模范，他当初就是从俘虏营被发配到穷乡僻壤的。他受尽歧视，但硬是咬牙打拼，在那个几乎与世隔绝的山村干出了一番成就。那时不少有背景的“镀金客”下乡一两年就大红大紫，捞足资本而去，他却是苦干九年后才“成名”的。然而很快知青运动就退潮了，他付出了青春和血汗却被社会所遗忘，后来的生活很坎坷，要说没有失落感，非人之常情也。

今天人们对他们这些当年的标兵常持两种态度：或者嘲笑、厌恶他们“极左”，甚至认为他们沽名钓誉别有所图，很为不屑。或者欣赏这种“极左”，至今还歌颂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并认为那时比“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今天高尚。

作为一个虽非“红人”、但也小小“先进”过一把的当年知青，今天我要对这两种态度说句公道话：人皆有俗，也难免俗。想用表现“积极”来改善自己的处境，只要不伤害别人（这很重要！为自己得利而伤害他人，这就是恶、甚至是罪了。那个时代这类罪恶确实很多），就无可非议，正如今天打工经商赚钱也无可非议一样。如果这种表现给他人还带来了好处，例如一些知青“赤脚医生”治病救人之类，除了无可非议他还应该得到赞扬。而假如自己先因为受到迫害而陷于不幸，为了摆脱不幸而“积极”表现，那么除了无可非议他还应该得到同情。

但是，问题在于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仅仅用这种世俗动机来解释“表现积极”的确是不够的。因为，当时那种环境与今天的打工赚钱有一点不同，今天打一天工可以赚一天钱，赚不到我就不打了。而当年我们是别无选择，而且环境又不公平，“积极表现”受到赏识改善了处境的当然有，但因为“关系”、“背景”受到赏识、根本没怎么努力就大红大紫的也不少。而更多的情况是你怎么“表现”也没用，人家照样歧视你，你还是在最底层挣扎。在这种情况下，从世俗的角度讲，你的“表现”有什么意义？像我的朋友陈念昆，插队后的六年里一直受歧视，直到第七年才被自治区知青办一位负责人在田林调研中发现，树为先进典型。那么此前的岁月他是怎么熬过来的？如果没有那位“伯乐”发现他，他又怎么过下去？

可以设想的答案无非有三：首先，这种“怎么表现也没用”的状态在多数情况下会使人沉沦，许许多多的知青就这么变得玩世不恭，破罐子破摔，一辈子就这样毁了。如今关于知青的文字有的把他们描绘为一群偷鸡摸狗之徒，的确有这种情况，当然这不能只怪他们。——就凭这一点我今天就无法歌颂那个所谓“激情燃烧的岁月”，更讨厌“青春无悔”的说法，尽管我自己并不后悔什么。

其次，面对逆境，一些人也可能善于思考，变成了旧体制的叛逆者，把人生的意义建立在一中别样的理想之上，就像索尔仁尼琴那样成为大彻大悟的先知。但是这实在太难太难，不但难在勇气，更难在环境的闭塞。例如，对于那些投奔缅甸、出生入死的云南知青而言，他们并非没有勇气，但是他们没有找到“别样的理想”，他们所受的教育和所见所闻，不可能使他们知道除“世界革命”之外还有什么值得为之奋斗的高尚价值。

但当时我们还是太需要理想、太需要信仰了！这就有了第三种可能：哪怕是自欺欺人、虚无缥缈的“理想”，只要它能赋予我生活的意义，能使我做的一切显得有价值，就能成为我在那样一种环境下不自甘堕落的精神支柱。当时的意识形态说“宗教是麻醉人的鸦片”，其实意识形态本身当时就起了麻醉的作用。而从某种意义上讲，人是需要麻醉的。尤其是在那个无望或者说是绝望的环境中。从世俗角度讲“怎么表现也没有用”的情况下为什么我们仍要“表现”？第一固然是俗心未泯，仍在期待“伯乐”，希望这些表现最终能够有用；第二也是“信仰”使然，在看似无价值的存在中似乎发现了某种超验的价值，无意义的生活似乎也就有了超越性的意义。今天回想，为什么我能坚持那么久而没有沉沦？因为我有“理想”。这听起来十分高尚，其实想想也很无奈：除了追求那个虚无缥缈的“理想”，在当时那种状况下你还能追求什么？如果什么都不追求，行尸走肉般地苟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也正因为这样，我当时活得很努力但也很“超越”，比如说读书求知，我那时读书不是为了高考（当时也没想到会恢复高考），也不是为了职业而寻求某个专门领域的发展，就是漫无目的的“爱智求真”：从《解析几何》到鲁迅杂文，从《电工学基础》到《1971年公社史》，从《山坳冷烂田的改良利用》到《韩非子集释》，从《华南经济地理》到《苏联的社会化农业》，从张道真的英语语法到王力的古代汉语、从县里各部门的规划册子到文化馆油印的《北路壮剧曲谱》，凡是能到手的书我都看着很解渴。有时礼拜天走老远到公社赶集，到了不是去集市，而是一头扎进公社办公室去翻看近期积存的《参考消息》和各种部门简报，直到快散集了才去买些剩余货。以至于坝官村的三个男生“赶集看报纸”成为我们公社知青中流传的趣闻。但是看这些干什么？我也不知道，当时的说法叫做“为革命而学习”吧。而“革命”对我而言实际上就是使无意义的生活变得似乎有意义的一种说法。

#### ◇ “大业当从小事谋”

前些年，美国《新左派评论》前主编佩里·安德森在访谈中曾问我：很多人在学校闹文革时的浪漫理想，接触社会现实后都破灭了，林彪事件后更是如此。那么你的转变是在什么时候？我老实告诉他：没什么转变，真正要说转变那是在1989年。他觉得很诧异。其实在农村日久，见到了太多的严酷现实，“理想幻灭”肯定难免，但在那个信息闭塞的年代也不可能有另一种理想来取代，如果不想自暴自弃而沉沦下去，你还是只能以原来的理想作为精神支撑，尽量赋予沉闷无尽的生活以某种高调的意义。记得林彪事件后《571工程纪要》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的说法的确给了我很大震动，以至于这个《纪要》我当时几乎能背出来，但我还是本能地排斥这种说法。为什么？今天想来其实也很简单：假如我可以逃出这“劳改营”，看到这段话我可能就大彻大悟，“越狱”而去了。但那时我事实上别无选择，那么本来我似乎很有意义的生活一旦被说破——不过是如同劳改犯，而我又越不了狱，那还凭什么活下去？

因此我们那时不能不“崇高”地活着。我当年的日记里有一首“沁园春”词就是这样把“民族命运与个人使命”和眼前的生活相联系的：

光阴一去难留，存耿耿雄心叹未酬。  
但北顾天山，逆翰为患，东望闽海，台澎待收。  
千仞之阁，起于垒土，大业当从小事谋。  
须发奋，耕耘倍勤恳，修补地球。

那时我只能相信我们辛劳的耕作是“世界革命”伟大事业的一部分，不是因为事实如此，而是因为我只能相信如此！

正是由于有这种“理想”，今天一些人赋予了那个时代以许多玫瑰色彩。毋庸置疑，今天回顾这一段生活我也仍然有自豪感，自己毕竟没有虚度光阴。大道理不用说，即便从世俗的得失讲，我过去实际上就是在文革前读了六年小学，文革中三年“革命”与内战的“初中”时代实际等于失学，而我1978年从农村直接考取了文革后首届招收的研究生。算起来九年的“早稻田大学”与正常的六年中学加四年本科相比，时间上其实也没吃什么亏。更何况我的价值观、思想、知识结构、社会关怀与人生体验都与这九年的生活有关。这是课堂里不可能有的收获。

从15岁到24岁——应该说这正是人生中最宝贵的黄金时代，也就是所谓的“青春”。就我个人而言，我这青春确实没有什么可悔的。而“理想”也确实是我能坚持下来的原因之一（当然，只能是“之一”。我见过太多努力者的不幸结局，如果知青运动晚结束哪怕五年，我也不知道自己会怎么样）。所以我觉得一味讥笑与厌恶“理想”是很浅薄的，即便对于“错误的”理想也是如此。其实，除了个人升官发财这类纯属私欲性质的所谓“个人理想”外（这里并没有咒骂“私欲”的意思，只是通常人们都不会把这样的欲望称为“理想”，一般而言，作为褒义词的“理想”都是具有超越性的），凡具有超越性的理想，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信仰”，在“律己”方面都是类似的，仅就这一点而言，一个虔诚的共产主义者和一个虔诚的基督徒、虔诚的穆斯林或虔诚的儒家并没有多少区别。（就此而言，信仰因而也不该有“错误”与否之分，这也就是信仰自由的理由）不同的只是在“律人”方面——由于主张不同的制度安排，就会导致很大的差异。

#### ◇ 律己的理想与律人的“理想”

我不赞成那种意在肯定上山下乡运动的“青春无悔”之说。姑且不说强制动员下的上山下乡运动中，绝大多数知青对于并非自己选择的安排只有抱怨与否的问题，没有“后悔”与否的问题，（如前所述，我是少数自己要求插队的知青之一，但那种情景下的“自己要求”实际也并非真正的自由选择）也不说知青运动在成就了一些人（我应该属于这些幸运者）的同时毁掉了多得更多的人。我只想指出两点：

首先，当时的“理想”在律人方面确有严重弊病，这种意识形态强调“斗争哲学”，尤其是“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在“理想”的名义下斗人、整人、迫害人，乃至更一般的强人所难、己所不欲硬施于人的事太多了！我前面说“想用表现‘积极’来改善自己的处境，只要不伤害别人，就无可非议”。但事实上当时相当多的“积极表现”就是伤害了别人，尤其是因“积极”而多少获得了一些权力后，这种事的发生概率就更高。扪心自问，我没有做过这种事，这不是因为我多么高尚，而是因为我从未“进步”到与权力沾边。

其次，正因为“除了追求那个虚无缥缈的‘理想’，在当时那种状况下你还能追求什么？”这种“理想”就显得十分无力：只要情势变得可以追求别的了，那“理想”就顿时崩溃。说到底它只能靠强权来维持。前面所说那种“越受迫害表现越积极”的现象，反过来就是迫害消除，“理想”反倒没有了——许多人在被“打入另册”时尽管“再表现也没用”，但还是虔诚地“表现”——所谓虔诚就是尽力假设自己这么做不是被迫，而是出于为了理想主动奉献，以使生活显得有意义。但一旦真的不再“被迫”，那种“生活的意义”反倒消失殆尽，他们几乎都作了另外的选择。当政策允许知青可以回城（并非强迫他们回城）时，大量的前知青积极分子都走了。

前面提到的念昆兄就是这样。他当年团结一批被打入另册的伙伴在逆境中艰苦奋斗，可歌可泣，终于使他领导的央务知青小组熬成了全广西第一号知青“先进集体”。但1977年高考一恢复，“先进集体”顿时军心大乱，大家纷纷回城复习备考。为稳定军心，自治区知青办领导当时曾私下承诺为他们争取特殊待遇，使他们无需回城复习也能被录取。但后来承诺却无力兑



现，弟兄们感到被骗，几乎是一哄而散。结果还没等到1979年后的知青回城大潮，这个耗尽他们青春和血汗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先进集体就已经灰飞烟灭。

我当时仍然在村复习，没有回城（当然也很少出工了），原因不过是在城里我已无家可归，我父母当时也下放在一个穷县，条件不比田林好，加之那时我因搞乡土文艺小有名气，与县文化馆关系很好，可以从他们那里取得任何县里有的书籍。所以我不可能也无必要回城复习。而我过去虽一直被认为“表现不错”，却也并非鹤立鸡群。这次却由于连头号先进集体都已大乱，而我却仍然在农村坚持，被刮目相看。于是我递交多年的入党申请很快被批准，而数月没怎么出工的我又成了文革后恢复劳模称号后的首届“县劳模”。其实那时谁都清楚：知青运动已是强弩之末，我不久就因考研成功而离开，但即便没有考上，很快也是要走的。

所以像我们这样的“信仰”确实无法与那些法国传教士相比。他们是为了信仰而放弃了世俗利益，而我们无论意识到与否，实际上是在世俗利益被剥夺、没有什么可放弃的情况下树立“信仰”的。一旦可以选择，我们就不再坚持。这样看来，我们真的虔诚吗？确实很难说，在那个连家信、日记甚至情书都充满了“豪言壮语”的年月，至少像我这样尽管“表现不错”、但并非大红大紫地被用于宣传的人确实没有想欺骗谁，只是希望自己活得有价值、并非行尸走肉而已。

但我们确实“经不起考验”，像常井墓地中那些为信仰虽九死而无悔、甘愿埋骨穷乡僻壤的宗教圣徒，我们中几乎一个也没有。知青运动潮落后仍然留在村里的绝无仅有者，也多是因成了家、有拖累、在城里生存困难等世俗原因而留下的，他们现在多已被遗忘，在缺少人生意义和尊严的艰难生活中老去，没有谁问他们是否“青春无悔”。而发出这种豪言壮语人都已离开农村，评价知青运动的话语权如今也是在后者、尤其是今天有头有脸的人那里，但是我们这些幸运者真比那“沉默的大多数”更有资格评论这场运动吗？

#### ◇ 弘扬艰苦奋斗的“知青精神”和反思荒唐谬误的“知青运动”不矛盾

铁的事实是：历数古今中外的大规模移民运动，当年那场“知青运动”应当属于最失败之列。汉代徙民实边，明代大兴军屯，清代以来的“闯关东”、“走西口”，俄国的哥萨克移民东方，欧洲人殖民新大陆，华人开拓东南亚，早期的犹太人漂泊四海、后来又从欧美回到荒凉的近东开拓出以色列——所有这些移民潮无论是自发的还是官方组织的，无论其中有多少是非，总还是留下了巨大影响，对相关地区后来的民族分布、社会变迁和历史走向都具有重要的乃至决定性的意义。就是我国当代的其他移民潮，从改革前的工业化移民和“盲流”，到改革后的“民工潮”，也都成为不可逆的“历史潮流”。但是那场“知青运动”，尤其是文革10年中2000多万知青的上山下乡大潮，作为与城市化历史趋势相悖的、以强制手段掀起的潮流，后来却退落得如此干净：不仅到农村的知青走光了，原来作为永久性戍边措施的“生产建设兵团”，除了新疆因知青回城请愿的“阿克苏事件”遭镇压而留下了一部分，黑龙江、云南、内蒙等地的“兵团知青”也基本走光了。知青运动结束时所谓的“三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不满意，（据说是邓小平说的）、“四不满意”（再加上国家不满意，据说是李先念说的）之说，可以说是对这场运动的盖棺定论之语。

但是，否定“知青运动”并不等于否定知青，因为那场运动并不是他们发动的。除了某些“与人奋斗”伤害他人者外，知青们没有做错什么。相反，他们在黄土地、黑土地和红土地上的奋斗，无论是无奈的还是“满怀豪情”的，也无论那豪情是虔诚的还是“表现”出来的，都堪称一部史诗，一部与苦难抗争的史诗。这里说的苦难主要还不是指物质意义上的艰苦，因为与当地农民相比，与同时期我国那些自发的移民即所谓“盲流”相比，知青未必更苦。我说的苦难更多是指他们被“运动”，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不知未来何在的这样一种心理煎熬，一种

无助的生存状态。他们为摆脱这种煎熬的奋斗，无论是积极的表现，还是无奈的挣扎，都是可歌可泣的。而支撑这种奋斗的“理想”，无论它是基于哪一种意识形态，也无论它的虔诚程度如何，在不伤害别人的前提下都是极为可贵的，它体现了人的意志力，一种与命运抗争、向往有意义的人生、为生命的价值而奋斗的意志力。

苦难中的奋斗是可贵的，与苦难抗争的过程是具有审美价值的。但苦难本身不是美，我们无需给苦难涂上玫瑰色的油彩来粉饰它，更不能去歌颂那种制造苦难的机制。这道理本来并不复杂，就像我们歌颂抗日战争但不能“感谢”日本侵华一样！弘扬艰苦奋斗的“知青精神”和反思荒唐谬误的“知青运动”不仅不矛盾，而且弘扬这种精神正是为了避免重蹈那个荒唐岁月。

从这个意义上讲，当年知青们为改变农村面貌而付出的实实在在的努力、他们为改善自身处境而做出的“积极表现”，和他们后来要求掌握自己的命运而发动的回城请愿运动，都是史诗般的壮举，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

念昆兄是知青运动盛极而衰时的先进典型，他与那位为自己一家的苦难向“红太阳”告御状的李庆霖先生、阿克苏事件中作为请愿回城知青的代表而受难的欧阳琰先生，在整个知青运动中扮演的角色似乎截然相反，但他们都非常令我尊敬。他们后来的人生也都很坎坷。而除了李庆霖先生“忽然成名”后卷入官场漩涡、被利用做了些火中取栗的傻事（那也不能只怨他）外，他们都没什么过错，而且都有大功于社会。今天我们都明白了马克思讲的这个道理：“每个人的自由是一切人自由的条件”。“民族命运”是由构成“民族”的一个个人的命运合成的，而“个人使命”也必须以个人权利为基础。“岂有百姓困穷，而国家自求富强之理？”（郭嵩焘语）天下兴亡，官家有责；监督官家，匹夫有责。而欲尽此责，匹夫须得有权（公民权利）。不改变“权力任意侵犯权利”的状况，我们的民族是不可能真正振兴的。

◇ 天下兴亡，匹夫先得有权利

当年插队的岁月，我曾经“大业当从小事谋”，以人类解放为己任，在那间草屋里不仅挂着田林县的规划图，还挂着印度支那抗美斗争的地图。最近我走了一趟东南亚，那当年“基里隆大捷”、“夜袭波成冬机场”、“激战鱼钩地区”的所在，仿佛是那么熟悉。然而我如今的所见所闻又那么令人毛骨悚然！我不禁想到：我们当年憧憬的东西对我们的“民族命运”究竟意味着什么？

多年以来我们这个民族在世界上的地位十分古怪：凡是我们认为的“友好国家”乃至“兄弟国家”，对我们的同胞——华人、华侨和华商大都态度很坏，而且似乎国家越“友好”，对我同胞越穷凶极恶！反之，我们当成敌人的那些国家，对华人、华侨与华商都很友好，而且似乎越是“国家的敌人”，对我们的同胞越好。就以东南亚为例，在这个素有排华、虐华传统的区域，印尼、越、柬、缅、马，都曾有过那种纪录，只有泰国对华人、华侨与华商应当说是最友善的。然而在我下乡的那个年代，泰国曾是我们东南亚的头号敌人，我当年在那个山旮旯里也经常收听到“泰国革命之声”，这个在我国支持下设立于昆明的电台天天号召要推翻“他依—巴博反动集团”（即泰国政府）。而我们称为“同志加兄弟”的越南，却对华人采取严厉的剥夺政策，而且早在与我们交恶之前好多年就已是如此。但是那还不是最糟的。与号称是我们“毛主席的最好学生”的红色高棉相比，该国算客气的了。而红色高棉，对华人就不是什么剥夺而已了，而是屠杀与灭绝。而且红色高棉不仅屠杀一般华人，还尤其把我国在华人华侨中培养的“侨共”几乎斩尽杀绝！世人皆知高棉人民在那几年经历的恐怖浩劫，而少人注意华人死亡率那时数倍于高棉人，华人中的“侨共”更是没几个虎口余生。但就在这同时，红色高棉却是我国认为的第一号铁哥们，为了救它，我们简直不顾一切，甚至不惜与“同志加兄弟”的某国发生一场血战！

今天我们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年，可是这种奇怪的“国际地位”似乎并未结束，君不见今天在工业化国家中，对华人、华侨、华商最开放最友善的是谁？不就是那个被我们视为“世界首恶”的国家吗？比例如此少的华人却能进入社会主流，大批成为教授、科学家、高官等上层精英，这世界上还有哪里能够如此？就是同为民主国家的西欧各国也做不到，众所周知，那里的华人基本上只能做小生意、开餐馆等，很少有机会进入主流社会。我们不少朋友是那里的“名校优博”，却鲜能在那里的高校谋职。当然，西欧各国对华人华侨华商也还算不错的，这仅从我们经常在报道中看到，我们的同胞在那里举行游行示威就可以看出——而在“友好”的缅甸，华人还敢示威？不要“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就烧高香了！那么主要工业化国家对华人、华侨、华商最恶劣的是谁？恐怕公认的就是俄罗斯了吧，那里不仅对我们同胞的刁难与勒索司空见惯，“灰色清关”、“新星号事件”那样的恶性事件也层出不穷。（不过与前述“更友好的”国家相比，应该承认俄罗斯仍然可以了，至少大规模排华屠华的事那里还没有过。）但是，奇怪的逻辑仍然是：对华人最好的国家似乎是我国的“首恶”，次好的西欧算一般，而最糟的俄罗斯又是我们在同类国家中的最爱！

怎么会有这么古怪的逻辑呢？我倒不是说对华人最好的国家就一定能与中国达到国家关系也最好。善于利用华人、华侨、华商的人力资源，与在国际政治及国家关系中跟中国竞争乃至对抗，也许不一定构成矛盾。也就是说，善待我们的同胞与公民也许并不是与我国形成友好、亲密关系的充分条件。但是在正常情况下，前者肯定是后者的必要条件！善待我们同胞与公民的国家未必一定是我国的友好国家，但虐待、屠杀乃至大规模残杀我们同胞与公民的国家必定是我国的敌对国家，而绝不可能是什么“友好国家”——如果我们这个国家搞外交真的是为了我们的“民族命运”，而不是仅仅为了“皇上”的面子。当年法国以马神父这个并非政府派出的“民间”传教士被清朝知县所杀为理由对中国发动战争，当然是帝国主义的霸道。但善待还是虐待本国国民（哪怕是“蚩蚩小民”）会严重影响本国与该国关系的好坏，却是任何民主国家乃至“民本”国家办外交的通则。只有那种不是为国民办外交、而只是为皇上办“洋务”的体制，才会遵循这样的逻辑：只要恭维好了“皇上”，虐待几个草民算什么事？如果再殷勤些，奉承得“皇上”龙心大悦了，就是对吾华草民大开杀戒，“皇上”照样会青眼有加的！

可是这些事情，当年为“民族命运”而把“修补地球”当成“个人使命”的我们完全一无所知。当我把农村中的艰苦劳作当成爱国大业乃至支援“世界革命”的大业之时，当在那法国人为了他们的国民被杀而向我们兴师问罪的事发之地，为大批屠杀我们同胞的屠夫们的胜利欢欣鼓舞时，我们真的是为“民族命运”作了贡献吗？

30多年后，我在金边见到当年“侨共”幸存者韩兴律师（他如今是韩桑林先生，即我国当时大骂的“韩桑林伪政权头目”、现今柬埔寨国会会议长的法律顾问）。他提到当年侨共发动华人华侨参加红色高棉革命，革命成功之际我国应波尔布特要求切断与侨共的组织联系，把全体侨共的命运交给红色高棉。一些侨共不愿加入柬共（即红色高棉），要求回祖国却遭北京方面拒绝，一些人愤而洗手不干，脱离“革命队伍”而自谋生计，韩兴即其中之一。结果只有他们中有人幸存下来。而并入柬共者很快遭到清洗，一些侨共领导如张东海等希图进入柬共后能得到负责柬华少数民族工作的高位，初时还积极效忠波尔布特，助纣为虐帮助捕杀华人同胞，但不久自己就被捕杀，几乎无人幸存……言者不胜唏嘘，闻者毛骨悚然。

我们当年为“民族命运”而上山下乡，今天仍在为中国的崛起而奋斗。但抚今追昔，我们所追求的到底应该是何种“崛起”？如果按上述那种逻辑我们“崛起”了，结果把那些我们讨厌的高人权国家（因而也是善待我们同胞的国家）成功地压了下去，而使那些我们喜欢的低人权国家（因而往往是虐待我同胞的国家）大行其道、越来越多，乃至遍布全球，等到“我们的朋友遍天下”之际，我们的同胞在这个世界上还有立足之地吗？

这样看来，我们怎样才能实现真正的中华崛起，真正改善我们的“民族命运”，为此我们又应该怎样看待自己的“个人使命”呢？

□ 原载《经济观察报》2012年07月06日

~~~~~

## 【文艺评论】

什么是《知青》“激情岁月”的激情？

• 徐 贲 •

电视剧《知青》再次引起了“文革”期间“激情岁月”的话题，有评论说，“这部剧显然不是‘老三届’们的专属，不同时代的人看过都会有截然不同的观后感。有的老知青认为剧中表现的知青生活不够艰苦；有的90后观众则认为当年的激情岁月值得向往”。需要追问的是，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激情岁月”。

知识青年在“文革”中的“上山下乡”不同于在这之前的少数毕业生因成分不好而被送到农场的“就业安置”，“文革”中的“上山下乡”是以“青年运动”的形式来裹挟几乎全体青少年到农村“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的。这种青年运动只有在“文革”的极权制度中才有可能。“上山下乡”不是去就业，而是去革命，去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个革命的乌托邦。在那时，作为共产主义未来一部分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成为许多青年人以革命狂热去追求的“天堂之梦”。在“文革”的环境下，任何人都必须至少在表面上装作相信这样的天堂之梦。

米兰·昆德拉写道，“极权主义不仅是人间地狱，还是天堂之梦”，没有这样的天堂之梦。统治权力就没有办法在人们的思想、行为中建立起它的全面有效控制。对天堂之梦的追随者来说，这一梦想使得他们选择无视罪恶和苦难，满眼都是光明和幻想。“文革”的时候，《知青》的作者梁晓声如果曾经如此，那本不足为奇，但在“文革”过去几十年以后的今天仍然如此，而且要以此来影响他人，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

“文革中”老三届知青上山下乡的时候，大的不过二十一二岁，最小的还有十三四岁的。这是一个人生命力最旺盛的时期，即使没有任何别的燥动，他们也有心理和生理上的激情。“文革”所利用的正是年轻人这种心理和生理燥动的激情，给予它政治斗争和群众运动的渲泄渠道。在短暂的亢奋之后（可以大致以“林彪事件”为分界线），随之而来的是知青们普遍的彷徨、迷茫、失落和绝望。失落和绝望，那才是激情表象后面的真实景象，写知青，如果写不到这一层，那就顶多是浮光掠影、隔靴搔痒而已。

如果没有知青们用自己亲身痛苦体验换来的普遍失落和绝望，如果所谓的“激情岁月”一直在维持，那么，后来当回城的闸门打开之时，又怎么会有几乎所有知青奔涌而至的返迁大潮？这就像“文革”时期，人人表忠心，个个激情昂扬，高喊“誓死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后来，“文革”与毛本人一同寿终正寝，没有见谁出来誓死捍卫的。这就是极权统治下那种典型的“热烈的浅层支持”，它会几乎在一瞬间令人难堪，出人意外地突然崩溃。在“誓死捍卫”的表象后面隐藏着难以察觉的失望、怀疑和伪装，即便大多数都是下意识的，也足以让人怀疑，是否能将“文革”说成是一个中国人忠于领袖，坚持革命信仰的“激情岁月”。

真正的“激情”是一种人的自由意志的激发，而“文革”时期的人是不具备这种自由意志的。“文革”中的上山下乡看起来轰轰烈烈，响应号召者看起来个个摩拳擦掌、欢欣鼓舞，其实，

有过亲身经历的人都知道，许多下乡的青年都只是迫于形势，不得不如此罢了。他们对上山下乡，同样是一种“热烈的浅层支持”，而并非什么持久的激情。当时，因为病残而能够留城的极少数学生，不知成为多少人羡慕的对象；而高喊和积极表现“扎根农村”的，恰恰是为了争表现，好早日有机会离开农村。

当然，大多数的青年学生确实是响应了上山下乡的号召。对于处于生理激情期的青少年来说，这一点也不奇怪。上山下乡是一场由“革命”意识形态主导的群众运动，被称作为“上山下乡干革命”。确切地说，上山下乡是“文革”群众运动中的一场亚运动，运动的主体对象是“老三届”的青年学生（至少开始时是如此）。这一青年运动与其他一些青年运动非常类似。

意识形态对青年人具有特别强烈的吸引力，与他们特殊生理期的心理、情绪和认知特点有关。吴潮和赵晓兰在《纳粹运动与德国青年》一文中指出，青年层的主体都处于平凡状态，但比其他年龄层却多了一份自命不凡和向往轰轰烈烈的心境，“他们常常更容易感到失意和压抑，追求着失意中的奋起。在当时，德国青年人弥漫着一种如醉如狂的情绪，其中既有那些在世界大战中扛过枪的人们，也有那些在凡尔赛和约令人沮丧的影响之下成长起来的人们。……在思想上他们渴望着某种能给心灵和幻想带来激荡的东西，某些值得为之而生活的理想，这是当时德国青年整体精神状态的画面。凡尔赛和约的某些条款以及战后德国的混乱状态又削弱了国家对于未来一代的成长和教育影响，希特勒及其纳粹主义终于首先在德国青年身上找到了最热烈的宣扬者和最坚决的执行人，使大多数人坚信自己是在追随着一种伟大的思想”。

青年运动的原则是打动他们的人心，唤起他们的激情和热烈情绪。上山下乡的宣传非常能够投合年轻人的特点，利用他们的弱点，焕发他们的热情。青年人的性格和举动常有明显的相悖之处。他们追求无拘无束、自由浪漫，他们喜欢群体生活，害怕孤独，在群体中他们可以感受到互相支撑与感染的力量。这使得他们能够接受哪怕是非常严酷的纪律和命令，甘心置身于对人身自由具有强制性的团体之中。青年人有着一股自然而然的冲动，要加入组织和团体，要大轰大嗡激荡人心的行动，要在凡是可能的地方采取行动和显示自己的力量。参加“建设兵团”、成为准军事化编制中的一员、身着军装制服、遵循仪式化的生活常规，这些组织形式对青年人具有一种特别强烈、神奇的吸引力。

这种充满着激情和戏剧性，激荡着表演冲动的场景与行为大量出现在《知青》中，成为它所展现的“激情岁月”的基调和主色。好的知青故事应该让读者看清它的虚幻，而不是对它怀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和向往。随着岁月的流逝，随着越来越多人的经验增长和政治判断力的成熟，这样的“激情岁月”已经越来越暴露出它的虚幻实质。如何认识这种“激情”，把它理解为一种迷幻，还是一种真实，考验每一个知青文学或文革文学作家的政治、道义、人性判断。如何看待《知青》中的“激情”展现，把它理解为一种觉悟，还是一种愚蠢，是自由选择，还是被迫洗脑的结果，同样也是每一个观众自己必须仔细加以思考和辨别的。对这一点，不需要有一个所有人一致的结论（这本不是争论的目的），但它会为我们提供一个共同的机会，让我们有理由再次想一想，“文革”真的已经离我们远去了吗？

□ 原载：作者博客 2012-07-08

~~~~~  
【痛定思痛】

“卞仲耘校长铜像揭幕仪式”观后

• 匡卫群 •

近日又认真看了一遍卞校长铜像揭幕仪式的光盘，才敢写下一点感想。

一位作家说过，每一部十字架下都埋藏着一部长篇小说。但是，在文革那段历史面前，一切文字都显得苍白无力，那实在是一个难以记述的悲惨世界。要真实记述那个时代，不但需要正直和良知，还需要深刻的思考与敏锐的洞察力，更需要太史公“人固有一死”的勇气。然而，做齐简晋狐的史官难，做含泪劝民的佞人易。因此，在一片盛世的升平声中，在“文革”已成敏感词而被屏蔽的今天，能够看到这样的一部振聋发聩片子，套用鲁迅先生的话说：“这是怎样的一个惊心动魄的伟大呵！”

是的，这是我看过的记叙文革的影视片中，最令我感动的一部。虽然它只是记录了一个铜像揭幕仪式，但是那些参加者的发言，和一幅幅历史画面，又将我带回那个惨痛的日子。为了写《食指》，我已经将那个日子烂熟于心；但是，再次面对卞校长浮肿的遗容，听到学姐们泣不成声，我依然难以抑制心中的悲痛。它是没有大家的大家之作，足以与那部《我虽死去》相比肩。全片的解说生动准确，画面简洁流畅；小林先生的诗歌，满里先生的配乐，平英学姐的朗诵，都已臻化境。更宝贵的是几位学姐对“8.5”事件的反思，从国家民族层面，解剖当年自己，也解剖今世人伦，引人深思，发人深省。没有几十年沧桑岁月的积淀，是写不出这样泣血的诗歌和文字的。如果我是母校领导，我会要求学生们在开学时都看一遍它，让他们永远记住，在这个圣洁的校园里，曾发生过怎样的邪恶！而在邪恶发生后，他们的前辈，曾以怎样的良知和勇气，直面地上的鲜血，做出真诚的忏悔与反思！

“黄昏血色，往事何堪回首；绿地晨曦，今朝勿忘反思”；对于母校学生，这段话实在是应该终生铭记的校训！

我很佩服高宁学姐说的话：“我们也是这件事发生的一个根基。所以今天我们有义务有责任用我们的行动去忏悔、去谴责、去反思，这是我们对社会的一份承诺与担当。”

“对社会的承诺与担当”，掷地有声啊！

一个不会反思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在同一条河里淹没两次，上天不会再救你。痛定思痛，回首我们亲历的那个年代，我们该反思什么？

上周重读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里面有段话，简直就像专为一百多年后的中国所写的。恩格斯在分析历史事件发生的动因时这样说：

因此，如果要去探究那些隐藏在一——自觉或不自觉地，而且往往是不自觉地——历史人物的动机背后并且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那么问题涉及的，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的民族，并且在每一个民族中间又是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而且也不是短暂的爆发和转瞬即逝的火光，而是持久的、引起重大历史变迁的行动。探究那些作为自觉的动机明显地或不明显地，直接地或以意识形态的形式、甚至以被神化的形式反映在行动着的群众及其领袖即所谓伟大人物的头脑中的动因——这是能够引导我们去探索那些在整个历史中以及个别时期和个别国家的历史中起支配作用的规律的唯一途径。恩格斯指明了关键所在：要弄清是什么使中华民族在十年文革中全体疯狂，就要弄清是什么以“意识形态”的形式、甚至以“被神化的形式”，反映在行动着的群众及其领袖的头脑中。简言之，那时的我们和那时的领袖，在追求什么？要实现什么？那时我们所追求的，是从小就被父母和国家灌输的人生终极目标：实现“共产主义”。领袖又告诉我们，实现这个主义的最佳途径，就是阶级斗争，就是反修防修，就是挖出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不打倒他们，这一事业就会夭折。因此，当大多数学生对“分分学生的命根，考考老师的法宝”满

腹牢骚时，领袖扔出的一粒火星，就足以引爆怒气郁积的火山。革命激情与崇高理想，成为红卫兵运动的催化剂，而暴行一旦披上神圣的外衣，天使也会变成魔鬼。这是我们这代人的悲哀。

而领袖所毕生追求的，不也是那个“乌有之乡”吗？虽然事后看，他发动文革的初衷，是要打倒刘，夺回失去的权力，但是从根本上说，他还是为了实现“环球同此凉热”的梦想。权力与梦想交织，实现梦想必须手握大权；“有了权力就有了一切，失去权力就失去一切”，对这个铁血法则，他当年在中央苏区被排挤受打击时，就有切身体会。在中国闹革命，自然要遵从中国特色的游戏规则。这个规则的第一条是“朕即国家”，用俗话说就是“老大说了算”。领袖没当上老大时，连颗星星都不是；一旦当上老大，就成了红太阳。规则第二条是“党即法”，党的决定就是法律，党的领袖可以“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规则第三条是“成王败寇”，或者说是“你死我活”。凡党内斗争的失败者，无不“身败名裂”。领袖一生视权如命，因其深知规则之无情。在这套规则下与天与地与人奋斗，最终演绎了十年内乱，这是领袖的悲哀。

而领袖以下，从刘主席，到我们的父母，对这套游戏规则又何尝不是奉为圭臬？从延安整风，到开国后反梁漱溟、高饶、胡风、反右、批彭黄张周，一直到文革，父辈们不都是虔诚地按照游戏规则，跟着老大斗来斗去吗？刘主席在文革中挨斗时，拿出宪法小本，高呼自己是国家主席，受宪法保护；他忘了按照规则，只有老大才有挥舞宪法与党章的权力；他也忘了那些胡风分子和几十万右派们，当他们的信件被查抄、日记被没收、人格被污辱、因提点意见就身陷囹圄，或被发配夹边沟化作枯骨时，宪法何在？公理何存？而卞校长，当她屡遭批斗，受尽羞辱，预感到性命不保时，她唯一能做的只是给上级党委写信诉苦，而不是状递法院寻求保护。这不是她愚昧无知，她清楚地知道，按照规则，除了党，没人能救她。这是卞校长的悲哀，也是我们父辈的悲哀。

十年内乱结束后，我们的父辈终于明白，不但那个主义遥遥无期，就连“小康”的门坎，我们都距之尚远。党纠正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对内搞活，对外开放，实现了社会的进步。但是，在总结领袖所犯错误时，重在评定功过是非，对原则问题却轻描淡写，因为中国需要新的“英明领袖”，而新老大只能按老规则产生。邓大人主政后似乎有改变规则的想法，但实践证明，他若不当老大，连经济体制改革都可能夭折，改变规则不是简单修改一下党章宪法，它涉及整个国体政体，正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六四”之后，他不得不收起改变规则的念头，一心推进市场经济。他在这个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功，但由于规则未改，政治上的隐患日益显露。在开国元勋相继谢世后，像领袖那样的绝对老大已不复存在。自上而下的制约逐渐弱化，权钱交易的诱惑不断膨胀，使得许多小老大越来越为所欲为。贪污腐败猖獗和贫富差距加大，正成为民怨火山的两个突破口，随时可能会猛烈喷发。人们发现，现状与历史竟日益契合；社会转了一圈，似乎又要回到文革的起点。

更可怕的是，一些投机者敏锐地察觉了民心可用，重弹阶级斗争的老调，呼唤回到毛时代，鼓动弱势群体揭竿而反。其目的，不过是想自己当个小老大。而他们共同为之造势的薄侯，也正做着“时势造英雄”的老大梦，想在政治博弈中占领制高点。平心而论，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兵，作为政治家谋求最高位置并不错。但不能走回头路，重蹈领袖覆辙。薄父文革中十年冤狱，薄母自杀身亡，薄侯会对文革一往情深？无非是看到民怨可用，遂“颁新政，恤民情，吟旧歌，整吏制，兴新狱，杀旧吏，剿豪强，禁讼师”，虽权倾一时，但靠个人崇拜和“群众运动”为自己造势，终逃不脱“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规律，反而又一次落入“成王败寇”的历史漩涡，这是薄侯们的悲哀，却是人民的福音。事实证明，历史是在螺旋上升，绝不会回到文革的起点。薄侯的倒掉，昭示着一个历史时刻。在这个特殊时刻，看到这张“警世通言”，感慨良多。正是由于对文革的反思不彻底，对规则的危害性认识不足，才为薄侯的旧调重弹提供了条件。如果当年的红卫兵，无论是否施暴，都能像学姐们这样真诚忏悔，深入反思，勇敢探索。我相信，产生暴力的土壤定将清除，束缚父辈的规则定将改变。看看海峡那边的变

化，便知孙中山所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是颠扑不破的真理。父辈们抛头颅洒热血创建了一个新中国，却没能完全结束专制体制，这是时代所局限，我们不能苛求。而我们已经走到新的十字路口，我们有责任也有能力，为建设一个真正民主自由平等的人民共和国而奋斗。学姐们为卞校长所做的一切，正是为这座宏伟大厦所添加的一砖一瓦，不但惠及当今，还将泽润后世。

2 0 1 2 — 5 — 3 0

□ 原载《记忆》2 0 1 2 年 5 月 3 1 日第 8 4 期

~~~~~

【一家之言】

我所知道的“联动”六冲公安部

• 马小冈 •

在某些人撰写的文革稗史中，描述了北京“联动”曾六冲公安部，此被视为“联动”最无法无天的罪行。其中描述的首次，是说在1966年12月26日，两名北航附中的“联动”成员因为偷窃摩托车被“北航红旗”当场抓住，“联动”为解救“落难弟兄”，在北展剧场首次聚会的当晚即首冲公安部；其后又连冲五次，最后公安部长谢富治一声号令，“联动”终酿灭顶之灾。

历史就像“古董”，赝品太多。据我所知，坊间流传的“六冲”之说不足信。特别是首冲，与事实有较大出入：第一，时间有误。事实上“一冲”是在1966年12月16日，即在“联动”首次大规模聚会之前10天。第二，对象有误。“北航附中红卫兵”确实有人偷了摩托车，但事出有因，且“北航红旗”所抓的两人均不是偷车人。第三，原委有误。“一冲公安部”的真实起因源于一场大规模武斗；其后几冲则是“一冲”的延续。

“六冲”的最初版本源自1967年蒯大富（清华大学造反派头头）麾下的《井冈山》战报，其后被转抄演绎，逐渐在坊间广泛流传和引用，至今难闻不同声音。四十余年过去了，作为当事人之一，我觉得有义务对事件的原委和经过做一些追述，以便后人对那段历史寻找佐证。

一、时代背景和武斗双方的结怨过程

北航附中在海淀区学院路的北京航空学院（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园西南角。那时附中与大学园区仅隔一道铁丝网，没有围墙。附中的体育课和运动会基本都在大学的大操场进行；而附中同学流连忘返的地方常是大学校园的飞机停机坪。那是一个心存理想，放眼世界的时代，许多年轻人立志改变祖国落后的航空面貌，纷纷报考北航和北航附中，于是北航和附中的生源骤增，自然也就提高了入学标准。当时北航为了保护被打成右派的一批青年教师，把他们安排到附中教授代数、几何、物理、化学等，附中的师资力量甚至超过了海淀区的101中学及城里的一批名牌老校。1964年我刚入学时看见校园里到处是“欢迎你，未来的工程师”一类的标语，那时走又红又专的道路，献身祖国航空事业的氛围非常浓厚。由于涉及国防科技，北航以及北工（今北京理工大学）校门没有校牌，学生不戴校徽，附中也按此规矩行事。

那也是一个政治挂帅，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除了学校安排的政治活动以外，一些干部子女比较多的学校往往自发形成一些小团体，大家时常凑在一起分析形势，纵论天下，例如议论流传的毛主席与毛远新的谈话等内部资料，这其实就是后来“红卫兵”的雏形，活动方式则



采用“桃园经验”的扎根串联组织“阶级队伍”。因在海淀辖区内的大学附中基本都是住校，与城里走读的四、六、八中类似的小团体相比，附中的学生朝夕相处，凝聚力更显强劲。

1966年6月文革发动初始，因为国内形势发生巨大变化，我们的小团体活动增加了。6月8日当清华附中红卫兵受到围攻时，尚没有正式打出“北航附中红卫兵”旗号但已初显组织能力的一大批同学赶到清华附中声援，我们随时能够调动起来的强大能量让进校的第一个工作组（由团中央派出）十分吃惊。这支以阶级斗争理论与桃园经验为指导的工作组，竟然把用同样理论武装起来的我们这个团体当成了整肃对象。6月14日召开的全校大会上，在工作组的安排和支持下，个别教职员煽动说：“咱们学校有个裴多菲俱乐部，他们经常进行非法活动，他们眼睛是红的，要杀人……”。此言一出全场大哗。高三的岳小东挺身而出愤然反驳，陈昆岗、丁林生、张志平、刘平东等众多同学纷纷站到了他的身边，从那一天起形势迅速逆转，该工作组在无可奈何中撤出了附中。

“北航附中红卫兵”就此成立，且声名大噪。当时北航的赖瑞瑞找到我校刘会远，要求加入附中红卫兵。刘会远表示愿意帮助他们成立大学红卫兵组织，并向其提供了一些文件，于是附中与北航的文革运动有了比较密切的联系。

时值文革初起，无论是附中还是北航，校园秩序几乎处于无政府状态。有一次参加全市大型活动需要成立一支纠察队，在北航拒绝派车的情况下，附中红卫兵采取“革命行动”撬开体育场的看台大门，抢了几辆存放在车库里的摩托车；其后北航红卫兵派了原校体工队的王向当教练，此事在附中几乎尽人皆知，但也为日后的“一冲公安部”埋下了伏笔。

“北航附中红卫兵”最初与大学的造反派组织“北航红旗”尚无纠葛。运动发展到1966年11月，“北航附中红卫兵”因与北航红卫兵的“八一纵队”在反对中央文革方面观点一致；而以韩爱晶为首的“北航红旗”在中央文革的鼎力支持下掌控北航大权并残酷打压“八一纵队”，强迫赖瑞瑞（建材部长赖际发之子）、孙倩玲（交通部长孙大光之女）等人身背“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牌子在附中北侧的必经之地“劳动改造”，以此向附中红卫兵施压；又以掌权者身份强行收缴了由我们控制的摩托车，而且大力扶持我们的对立派“北航附中红旗”，插手附中内斗，这冤家自然就结下了，从此双方势不两立。尽管“北航红旗”位势居高，但“北航附中红卫兵”并不服气。

## 二、还原四十六年前的场景

1966年12月16日，“反革命分子伊林·涤西”（伊林·涤西为化名，此两人因对林彪提出质疑于12月20日被捕）被拉到北京林学院（现北京林业大学）批斗，“北航红旗”开着校体工队的摩托车去站脚助威，被前去声援林院附中红卫兵的我校陈昆岗（老高三，红卫兵头头之一）和叶文毅（老高一，红卫兵鹰派）等人发现，出于对“伊林·涤西”的同情和对“北航红旗”的反感，叶文毅故意捣乱从林院把“北航红旗”的捷式“佳瓦”摩托车偷走。陈昆岗觉得在人家地盘上惹事不妥，曾竭力劝阻，但未成功。

1966年本人在北航附中上高二。高中男生往往好勇尚武，杠铃和拳套是本人的最爱，当时练就得肌肉发达孔武有力，被人戏称为北航附中红卫兵“八大金刚”之一。就在12月16日当天下午，我和李冀安、叶文毅、黄建新等人正在楼前空地上练杠铃，忽见来了5位“北航红旗”的人（4男1女）言称来找摩托车并欲直接进楼搜寻，因对“北航红旗”没有好感并觉得对方擅闯宿舍楼，我们与对方先是发生口角，其后对方一高个男子出言不逊，被李冀安一拳击中腹部，此人当场倒地，5人遂迅速撤离。约20分钟后，北航广播站传出紧急集合的呼叫声，因估计不妙，我和叶文毅便急忙跑到教学楼踹开体育器械室的房门抢出一些体操棒和铅

球，随后大伙把宿舍楼道用双人床堵塞，我方留校的约15位男女同学则全部撤到3楼。当时1楼的电话突然断线，李冀安便在被围之前骑车到八一学校和石油附中告急；岳小东则到清华附中告急。我们刚刚准备完毕，就见从教学楼东侧校门闯进黑压压一大群人迅即将我宿舍楼团团围住，人数将近三百人之众，为首者即“北航红旗”的二把手井岗山（人名）。围楼者中似乎有外地赴“北航红旗”串联的人马，他们二话不说上来就用砖石将1、2楼的玻璃全部打碎，其武斗手段老辣娴熟。尽管他们把宿舍楼围了个密不透风，然而因发现我们有所准备而无人敢直接进楼。我们将3楼窗户全部打开以免玻璃飞溅伤人，下面的砖头石块则不断飞进来，我们一边躲闪，一边还击。我在3楼309房间冒着不断飞来的石块探出身子用照相机拍照，楼下的人群迅速闪开（以为我手里有什么神秘武器），我感觉他们人虽多却无心硬攻，便与各位同伴商定，死守待援。双方就这样僵持着。“北航红旗”虽然二十倍于我方人员，但如果不是后来发生的事情，我认定他们占不到什么便宜。没想到大约半个小时后，陈昆岗突然说：“我下去和他们谈谈……”我一把没拉住，这家伙竟从塞满床的楼梯空隙中钻下楼去了！（当时我就骂这厮，都什么时候了还那么绅士！）结果还用说吗？没人上前与他握手，众人一拥而上拳脚相加，顿时将陈昆岗胳膊扭脱臼，又像捆猪崽一般将他绑了个结实拖地就跑。我等明知寡不敌众，但为了救他只能冲下楼去，黄建新刚刚冲出门口，就被对方用大块炉渣拍在头上，鲜血顿时盖住了半边脸；王青抡着体操棒狂呼着冲进人群，可没几下就已力竭，登时被人家按倒在地并被四脚朝天强行拖走，叶文毅扑到王青身上奋力相救，但敌不过“北航红旗”人多势众，陈昆岗和王青两人最终被他们抓走了。

这就是坊间传说的“当场抓住”的两个“偷车贼”。其实陈昆岗和王青与偷车毫不沾边，但因陈昆岗是我们的头头，“北航红旗”就是冲着他来的；而王青拼命过猛又身材瘦小，方便了人家拿住做了陪绑，实乃冤枉也！井岗山见我狂吼着直接奔他而去，指着我说：“我知道你能打架，我不理你……”他身边的人迅即将我围成半扇，但却无人靠近。女生钟锦屏也冲进人群与他们撕打，董偃琴等其他几位女生则手挽手站在宿舍楼门口，欲堵住他们进楼再去打砸抢……顺便提示一下：“北航红旗”抓走陈昆岗和王青并非因为他们“偷车”，要借机狠狠教训“北航附中红卫兵”才是他们的真实目的，摩托车只不过是借个由头。井岗山见任务已经完成，便指挥队伍迅速撤离。约半小时后，石油附中红卫兵“赤飙”战斗队的蔡东北、甘朝生、张小光等约计二、三十人赶到，可武斗已经结束。

这其中有一个阴差阳错的细节。当时我们并不知道“北航红旗”把陈昆岗和王青弄到什么地方去了，石油附中蔡东北等直接到北航要人，他们听说已将陈昆岗和王青送往公安部，于是乎二、三十辆自行车便风风火火直奔了长安街。其实“北航红旗”当时先把陈昆岗和王青押到北航主楼过堂审讯，然后扭送到五道口派出所，但派出所认定这是群众打派仗，拒收；于是“北航红旗”才分乘两辆卡车把人扭送公安部，这也就是“老兵”（即老红卫兵，一般指毛主席1966年8月18日在天安门首次检阅红卫兵之前成立的组织）的自行车轮子能够追上他们汽车轮子的原因。

正当“北航红旗”在接待室交涉时，石油附中蔡东北和人大附中王洪等人也赶到公安部北门前，此时大约在下午4、5点钟。他们发现了正押在卡车上的陈昆岗和王青，大伙随即一拥而上，“北航红旗”眼睁睁看着“老兵”把人抢走了，那一刻“北航红旗”的人虽占多数，但他们看见眼前的汹汹气势，竟然没敢争夺。师大女附中的郑中伟等“红卫兵16纵队”的人即时赶到，遂迅速将陈昆岗塞进一辆小车里接走，王青则暂时返回距公安部不远的红霞公寓家中。

当时公安部尚未接受“北航红旗”的捕人要求，在公安部北门外“劫车”成功后，事情本该结束了，但却横生枝节。因为在争抢的同时，得到消息的各路“老兵”已逐渐汇集到公安部北门，一部分人与“北航红旗”的人发生争执，公安部的接待人员看见局面几乎失控，便向“老兵”提出派代表向于桑副部长说明情况，于是石油附中蔡东北、甘朝生、张小光和人大附中王

洪等人被“请”进接待室，“北航红旗”的人则悄然撤退了。在接待室内大伙刚和于桑副部长谈了没几句，穿着军大衣的常务副部长李震突然出现在接待室并厉声说：“吵什么！把他们全抓起来！”于是这群被“请”进去的“老兵”先被押到公安部大礼堂，紧接着就被一群警察抓捕并戴上手铐，由警车送到陶然亭半步桥某监狱监禁。后来蔡东北调侃说：“如果那就叫一冲，我们是被他们请去冲的。”

从学院路的北航附中到天安门广场东侧的公安部，路程约有14公里，骑车需要一个多小时。我们后期赶来的同伴并不知道前面的人已经把陈昆岗和王青抢走了，而后期的自行车队伍却在不断扩大，那个年头虽没手机但处于青春躁动期的红卫兵一呼百应，中途相识的不相识的纷纷入列，甚至在马路对面骑车的人也调过头来凑热闹，于是乎上千人的自行车洪流直接涌向了公安部。

到了晚上7、8点钟，天色已黑，但聚集在公安部北门前的人群仍在不断增加。当人们得知蔡东北、甘朝生、张小光和王洪等人也被抓了，“老兵”们更是群情激愤地狂呼：“放人！”公安部对此突发事件不知如何处理，于是干脆不予理睬，结果反而使矛盾升温，人群开始骚动，一部份人便顺势冲进公安部内。此后公安部紧急调派解放军战士组成人墙，封锁北大门，把人群分割成了内外两部分。而门外的人群又分成了“文”、“武”两拨，“文”的部分有我校岳小东、清华附中卜大华、张小宾、宋柏林以及人大附中杨小平等共计9人到北门东侧的一座小灰楼的2楼与在场的公安部副部长于桑等11名干部据理力争，此时公安部已经知道“北航红旗”抓了人，但言称中央文革支持左派；卜大华则指称公安部下放专政权力，此举毫无道理而且会造成天下大乱。对方渐感理屈，于是只好“打太极拳”，“谈判”整整进行了一夜，始终没有结果。当岳小东、卜大华等人离开公安部已是黎明时分，当时天降小雪；而“武”的部分则彻夜在北门抗议和喧闹……。随着时间拖延，误解开始发酵，分割在里面的人饥渴难耐打算出去，但受解放军战士人墙阻挡根本出不去；外面的人以为里面的人也象蔡东北他们一样被扣押，于是口号声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一时间闹得鸡飞狗跳不可开交。为了支援里面的同伴，我们有人又骑车返回学校，掏出所有饭票求食堂大师傅给了一筐箩馒头，然后由李森和谷永胜硬是蹬着一辆平板三轮车从北航附中骑行两个多小时送到公安部门口，由众人举着筐箩将馒头越过人墙传进里面。但是人多馒头少不够吃，在里面的钟锦屏等人冲进公安部食堂，发现那里居然有粉肠（那时的粉肠算是奢侈品），于是众人开了一次荤。

有意思的是，人群中有“首都三司”的人马——侯×华（此人后来成为著名小品演员）等二、三十人在公安部南门外与我校女生任敏敏等红卫兵相遇，侯×华上前逼问任敏敏：“你们带刀了没有？带了就交出来！”任敏敏回敬说：“你敢搜身？我有把指甲刀，你要吗？”于是双方发生激烈口角，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清华《井冈山》战报有了一个“六冲”的“原创”。

事情一直闹了一通宵，公安部始终不作答复，无论是围堵的红卫兵还是阻拦的解放军战士都已人困马乏力不能支，可能公安部的头头觉得差不多见好就收，于是撤走“人墙”，众人随即逐渐散去。

陈昆岗和王青被营救之后藏进北京八一学校。这里说明一下：因八一学校离我校不远，而我校的许多同学都毕业于该校，八一学校红卫兵组织也由我校刘会远的弟弟刘历远、李森的弟弟李旦生领导，因此两校关系非常密切。约一周后，王青耐不住寂寞，从“八一”溜回我校看望大伙，被我们的对立派“北航附中红旗”发现，王青在返回“八一”到海淀镇上去买烧饼时，被跟踪而来的“北航红旗”再次抓捕；12月24日夜里2时，“北航红旗”的大批人马在北京卫戍区的协助下，大肆查抄八一学校。因“八一”的中、小学生在坚守的楼房正门做了工事（用各种家具堵住了通道），大学生的造反派们乘李莎莎（政治局委员，副总理李富春的外孙子）年幼贪睡，从他的房间越窗而入，绕过了值班人员防守的工事，把陈昆岗逮了个正着；同时把正

在睡梦中的李旦生等八一学校的其他中学生也一并抓走，然后将整个八一学校作为“联动据点”给“查封”了，其后即在该校举办了所谓的《联动罪行展览》。“北航红旗”如此兴师动众的抓捕行动，如果没有得到公安部长谢富治和中央文革的指使，是不可想象的。

陈昆岗和王青等人被关进北京陶然亭半步桥某监狱共计22天，1967年1月被释放。蔡东北、甘朝生、张小光和王洪等人被关押10天，由警察送回家中。当时陈昆岗和王青曾问过警方：“我们是什么罪名？”回答倒也干脆：“不知道。”

自12月16日北航附中的陈昆岗、王青被抓与被救；石油附中蔡东北、甘朝生、张小光 and 人大附中王洪等人被捕入狱；以及陈昆岗和王青又于12月24日被“北航红旗”再次抓捕，北京城的“老兵”立即作出公安部公然偏袒“北航红旗”的判断，于是被中央文革打压的怨气终于按捺不住，12月26日“联动”首次大规模聚会即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那时由北京老红卫兵组成的“联动”已经毫不掩饰地将矛头直指江青和中央文革，比11月“北航八一纵队”质问中央文革仅支持“三司”，打压其他群众组织的言论，更显出了露骨的“反革命”立场；公安机关随即与“三司”携手有计划地抓捕“联动份子”，此举必然引发“老兵”更加激烈的反弹。至于具体有几冲，因为其他几次本人没有全部到场，故不宜随意评说。但除了“一冲”以外，一些坊间描述的第二、三、四、五次明显带有分拆拼凑之嫌；而描述第六次“有10万北京市民奋起保卫公安部”，此说太过离谱，故稗史坊间所谓的“六冲”之说没有可信版本。

我和我校杨松林等人曾在1967年1月初再赴公安部参加抗议活动，但那是第几次，如今已无法确认；另据我校丁林生回忆，“联动”12月26日首次聚会之后确实有过几次“老兵”到天安门广场和公安部门前的示威行动，同时人群中也混杂大量的“三司”成员，他们与“老兵”呼喊同样的“反动”口号以达到混淆视听之目的，但最终被“老兵”识破，双方爆发过肢体冲突。

当时与陈昆岗和王青同时关押的除了蔡东北、甘朝生、张小光、王洪等人以外，还有董良翮（国家副主席董必武之子）、孔丹（中央调查部部长孔原之子）、李明清（政治局委员、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之子）等人。后来李明清被“北航红旗”吊在单杠上以酷刑折磨致死，只因为李明清是北航红卫兵“八一纵队”的成员。1973年北京市公安局逮捕了两名凶手并报告李井泉，但因“北航红旗”是轮番上阵毒打，分不清楚李明清最后死于谁手，李井泉表示不追究他们的责任。打死李明清后不久，“北航红旗”在中央文革的授意下又以“刺刀见红”的恶劣手段将彭德怀的两根肋骨打断，又将陪斗的张闻天头部打伤，可见他们的肆无忌惮具有多么足的底气。

如果那年头我们也寻一个理由把“北航红旗”的头头抓起来扭送公安部，一定被认为是异想天开的事情；但是反过来却可以——“北航红旗”作为一个造反派的群众组织行使专政手段，把两个根本没有偷车的“贼”扭送到公安局关押了22天；又混淆视听把这件事情的真相隐瞒了四十余年，这就不厚道了。

纵观“一冲”可分为五步：结怨—武斗—抢人—冲击—逮捕。此应为文革当中老红卫兵“一冲公安部”的完整版本。倘若有人能有根有据地拿出与此有别的不同版本，我无话可说；倘若没有，我则更不用再多说什么了。历史有戏说和信史，若只有当年掌权者的一种声音，显然是不正常的，也是不客观的。上述回忆是我与一些亲历者核对后做的整理，也许会有错漏，但大体不差。

“闹剧”中的两位“偷车贼”今都安在：陈昆岗现任中国××工业协会秘书长；王青现任北京××医院主任医师。前些年我还问过陈昆岗，当时哪根筋搭错钻下楼去了？他说真的是想

去谈判，没想到对方那么不讲礼数。

### 三、对历史的评说

在这样一个大动荡的时代，几乎每个人都被迫重新审视自己的理想和命运。“老兵”一代经过文革初期的狂热和迷茫后，他们发觉“四人帮”以倒行逆施的方式在彻底颠覆人们往日的希望和追求时，他们如同父辈那样以不惧生死的气概，义无反顾地站到了“四人帮”的对立面，这就是老红卫兵们在那个时代关口的一种觉醒状态，他们甚至在狱中高唱“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我一个，自有后来人。”那种不屈精神俨然带有浓厚的先驱者的理想主义色彩。

从表面看，“一冲公安部”带有偶然性，但其背后蕴含着深刻的历史必然。“北航红旗”倚仗中央文革的支持，在当时的强势地位几乎无人敢于挑战，但他们没想到事情并不那么简单。他们的捕人举动点燃了“老兵”心中积郁已久的怒火，全城相识和不相识的那么一大批青少年们能在数小时内就聚到天安门广场的公安部门前，并借势在其后的一段日子里又数度冲击公安部，其根本原因是大家对“四人帮”那一套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六冲”是文革当中“老兵”或曰“联动”对“四人帮”的最早和规模最大的群体抗争，对这个“偶发”事件的是非功过不管时人如何评说，我认为其实质就在于，那是一代心怀革命理想主义的年轻人对文革发动者的反叛。

我以为，古今中外的历史事件，指望群体参与者十分理性地指导和约束自己的行径是不现实的，判断历史事件的合理与否应该看其核心价值取向和是否代表时代潮流的先锋性。在那个时代，“老兵”或曰“联动”率先挑战中央文革倒行逆施的行为是应该得到肯定的；“北航红旗”以及以清华井冈山为首的“三司”为虎作伥是需要反省的。时人应该看到，否定文革也就否定了受中央文革支持的造反派组织的所作所为，有相当一部分文革的掌权者、受益者心里很不舒服。并且最高层里有人在文革当中不那么清白，他们以种种理由阻断对文革的批判。有了这样的呼应，我们即可从一些人对文革描述的字里行间读出他们不想忏悔的心思。

如今一些人重拾陈腐偏狭的派性思维，毫不掩饰地转发和引用当年“三司”对“老兵”或曰“联动”妖魔化的文章，津津乐道于文革式的攻击语言，甚至不惜沿用阶级斗争的“后血统”观念挑唆世人敌视当年的干部子女，使这幕悲剧持续上演着四十余年。尽管“老兵”们保持理性沉默且没人拿“黑五类”作为回敬，但这毕竟不公平。更有甚者则别有用心地把当今贪腐的利益集团与当年打江山的革命先辈混为一谈，以达到彻底推翻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这种舆论造势必须警惕。

在许多人眼中“联动”过去和今天都是一种恶名。记得当兵时，有一天中队教导员突然问我：“听说你参加过联动？”我不清楚他的询问缘自何方，可我矢口否认，最后不了了之；但我校丁林生就没那么幸运了，他先是被“附中红旗”的孙××“陪同”前往公安部“自首”（其时“附中红旗”已有军宣队支持并在北航附中掌权），其后又有“附中红旗”的侯××、左××、秦××等3人联名告发丁林生“参加过反动组织联动，是反对中央文革的反革命分子”，结果丁林生被所在部队审查整治了5年，此事影响了他的一生；石油附中的蔡东北也因身背“联动”恶名被所在部队关押2年……这样的事情不是个案，因为篇幅所限，这里不再赘述。

两年前，我们借春节之机与同班的“附中红旗”同学聚会，大家“相逢一笑泯恩仇”。当年的弱冠少年如今已是鬓发飞霜，我们刻意营造“逢人不说人间事，便是人间无事人”的气氛，其实内心都存有几许沉重。要说青春无悔，那肯定是假话。文革10年我们风华正茂，却在动荡惶恐中茫然度过。原来好端端的中学同窗只因观点分歧，对立成派竟闹到心存嫌隙几乎终生难以弥合的地步，足见文革对人的伤害有多么深重。

经过文革血与火的“洗礼”，我们对群众斗群众深恶痛绝，但愿能以我们的牺牲换来后人的觉醒。而今青年人多有不断翻新的时尚个性，却少了些红卫兵一代的血性激情；如果当年“老三届”追求崇高理想的精神能够传承下来，那么今天的社会风貌将会含有更多的高尚因素。正是因为经历了太多的磨难，“老三届”这一代人在思想上的成熟反而造成其边缘化的存在，这种现象将留给后人去细细思量。

□ 原载《炎黄春秋》2012年第6期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             |          |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